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中拉农业文明史交流

——“中国—拉丁美洲农业历史国际研讨会”综述

赵艳萍 丘文干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与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2)06-0134-04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一带一路”备忘录、自由贸易协议的签署,中拉的经贸关系、战略伙伴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与拉美地区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谱写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在此背景下,华南农业大学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农业技术合作,2020年牵头组建了“中国—拉丁美洲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简称“中拉联盟”),计有15国63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加入联盟,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宗旨开展合作。2022年恰逢中国与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建交50周年,中拉在农业交流、投资、贸易和技术等多领域的合作成果丰硕。与此同时,中拉学者开启了中国—拉丁美洲农业文明历史的交流,2022年7月5—6日,华南农业大学主办的“中国—拉丁美洲农业历史国际研讨会”隆重召开,由中国—拉丁美洲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和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所共同承办,通过线上、线下会议相结合的形式展开。

研讨会旨在“搭建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农业历史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平台,促进中拉农业文明研究的交流与互鉴,并推动中拉农业作物起源及互动传统等领域的深度研究,展示中国农耕文明的辉煌成就及对世界的贡献,讲好中国故事”,线上、线下参会者有来自华南农业大学、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四川大学、东南大学、墨西哥查平戈自治大学、墨西哥恰帕斯自治大学、哥伦比亚共和国银行—卡塔赫纳分行、秘鲁工程技术大学、秘鲁应用技术大学、秘鲁—中国发展与科学研究中心、秘鲁圣马斯科国立大学、秘鲁库斯科考古研究中心等14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100位领导、专家和青年学者。

中国和美洲均是世界栽培作物的起源地,中国农业上的“四大发明”:稻、豆、丝、茶影响了全世界,而美洲培育的农作物极大地丰富并改变了全世界人们的食谱,因此探索中拉的农耕文明有着重要的意义。诚如华南农业大学仇荣亮副校长在开幕致辞中所言:深入了解中国和拉美农业文明的发展历史,有助于促进双方农业文明研究的互学互鉴,推动中拉各国在农作物起源、农史文化及农业政策研究等领域的深度合作,为中拉各国农业振兴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动力,更好地传承与弘扬中拉农业文明。通过此次研讨会让更多人了解中拉悠久的农业历史与相关成就,探索拉美国家与中国农业合作的可能,这是开幕式中秘鲁驻穗总领事鲁本·埃斯皮诺萨(Ruben Espinosa)和墨西哥驻穗总领事馆代理领事丹尼尔·多明格斯(Daniel Dominguez)表达的意愿,也是举办会议的初衷。此次会议主要围绕着中拉重要农作物的起源和美洲作物的传播两大主题来开展。

[投稿日期] 2022-09-05

[作者简介] 赵艳萍(1979—),女,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史、灾害史;

丘文干(1998—),男,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史。

一、中国、拉美重要农作物起源研究

中国和美洲都是世界农耕文明的发源地。两方学者以近年来的考古研究成果来论证早期人类的生活状态。中方学者重点探讨了中国农业四大发明之水稻、大豆、茶叶的起源与传播以及养蚕缫丝的历史进程,而拉方学者根据考古植物遗存介绍了印加早期主要农作物的起源。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云飞研究员在《长江下游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主旨报告中,以其科技考古团队多年来在长江下游地区稻作文明考古的成果,从环境史的角度解开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水稻种植起源于丘陵地带之谜。该团队根据上山文化遗址群中出土的水稻考古遗存,明确了人类与水稻的互动贯穿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事实。通过分析田螺山、马家浜、茅山和良渚遗址中的古稻田面积及其中的水稻植硅体密度,测算出较为具体的水稻产量数据,提出了水稻产量提高过程与时人开始掌握土壤、除草及水稻品种改良等耕作技术密切相关的观点。藉此,郑教授强调科技考古在未来进一步深化水稻农业起源等研究中的重要性。

原产于中国的大豆传播到拉美后成为当地的重要农作物,是中国—拉美古代农业文明交流的见证。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所王福昌教授在《中国大豆的起源及其发展》报告中,从考古发现、文献资料、大豆读音三方面论证了大豆的“中国起源说”,并从整地播种、良种繁育、施肥灌溉、中耕除草、收获贮藏、轮作和间作套种六个方面简述了大豆的栽培技术,还强调了具有食用、药用和肥料效用的大豆在加工利用方面的丰富性。王教授通过分析中国先民言说、想象、叙述大豆的文本,指出大豆早在先秦时期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元素与象征,形成了与光辉的物质文明交相辉映的灿烂精神文化。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刘馨秋副教授在《中国茶叶起源、发展及传播世界》报告中,借助野生茶树的最新考察结果,区分了产茶地、饮茶地和饮茶文化发祥地三个概念,指出茶叶在中国国内的传播至迟在宋元之际已经完成,中国古典茶文化也随之发展到顶峰的事实。对于茶叶在东亚和欧洲的传播过程的考察,刘馨秋认为茶叶在传播过程中吸收传入区域的精神文化内涵,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域茶文化,报告以传承中国古典茶文化核心内容的日本茶道和融会英国本土文化的英式下午茶为案例,对东西方饮茶习俗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析。

蚕桑丝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国立足于世界的文化符号。山东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高国金副教授在《中国蚕桑的起源、发展及其影响》的报告中,展示了他所编著的兼具学术性与科普性的《中国农业的四大发明·蚕丝》一书的成果,以丰富的出土文物、文献资料,系统梳理了从远古时代的蚕桑起源到近代社会的蚕桑丝织技术的发展史,细述了中华传统蚕丝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根脉及其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影响。研讨会结束后,中方献上的线上中国传统丝绸“香云纱”服装表演,就是中国丝绸文化的生动展示。

拉丁美洲是全球多种农作物和畜禽产品的发源地,当地的土著玛雅人、印加人、阿兹特克人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秘鲁库斯科考古研究中心学术主任乔治·安特诺·卡列罗·弗洛雷斯(Jorge Antenor Calero Flores)教授在《库斯科地区从印加前期到殖民时期的古代民族植物学》报告中介绍了目前库斯科地区不同考古时期的植物遗存以及植物志存留情况。以印加前期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和西班牙殖民时期重整土地政策留下的土壤分层为断代证据,梳理了不同考古分区的种子遗存,并通过分析地质年代及印加早期的储粮工具,确认了最古老的种子遗存品种为玉米和甜菜,以及薯类作为印加早期最主要农作物的事实。在印加帝国最强盛的时期,玉米和藜麦成为库斯科地区种植最多的作物。由此推测,印加帝国时期作物种植已经被推广到其他殖民地。

秘鲁工程技术大学和秘鲁应用技术大学副教授乔治·依金·瓦斯奎兹(Jorge Aching Vasquez)在《秘

鲁利马帕查卡马克考古保护区的农产品述考》报告中介绍了位于秘鲁中部海岸的帕查卡马克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通过2009年以来对通往帕查卡马克圣殿的“南北大街”挖掘的文物遗存分析,可知当时与宴会相关的大量食物消费尤为突出,玉米、马铃薯和辣椒在印加人食物消费中占重要地位。作者试图重建历经印加人和西班牙殖民者改造的城市空间布局与结构模型,并利用各种出土供品对当时的朝圣活动进行还原。

墨西哥恰帕斯自治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埃米利亚诺·加拉加(Emiliano Gallaga)教授在《玛雅地区早期辣椒利用研究——以墨西哥恰帕德科尔佐为例》报告中,介绍了墨西哥恰帕德科尔佐地区的考古收获,包括出土的壁画和文物遗存。加拉加教授根据该地区出土陶器中发现的辣椒化学物质推测,当时人们可能已经在宗教、节日或日常烹饪中使用辣椒,并指出借助分子生物学等科技考古手段研究玛雅地区早期的辣椒用途具有十分广阔的研究前景。

墨西哥查平戈自治大学植物技术系爱德华·坎波斯(Eduardo Campos)教授在《墨西哥鳄梨的起源和多样性》报告中介绍了起源于墨西哥中部和南部,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8000—10000年前的墨西哥核心水果——鳄梨,从名实考的角度考察了阿兹特克语和盖丘亚语中“鳄梨”的语义。基于玛雅遗址的考古证据,坎波斯教授认为鳄梨至迟在古典玛雅时期已经被驯化,并利用《门多萨法典》中描述阿瓦卡特兰盛产鳄梨的象形文字、《佛罗伦萨法典》中对西印度系(Tlacacolaocatl)、危地马拉系(Quilaoacatl)和墨西哥系(Aoacatl)三种鳄梨分类的明确记载梳理了印加时期墨西哥鳄梨品种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三大鳄梨种群在墨西哥的地理分布、植物形态及其农业工业价值。

二、美洲作物的传播与作用研究

在中国外来植物史上,美洲物种的影响力是最大的。两方研究者从科技史、语言学、考古学的角度论及特色作物在全世界范围的传播。

四川大学历史系张箭教授的主旨报告《拉美农作物在华传播及其影响——以语言文化为例》从语言和词汇的角度解析拉美作物在华传播历程及其对中国语言文化产生的新影响。张教授以土豆、甘薯、烟草、橡胶等九种美洲作物为例,分析烫手山芋、卖红薯、烟酒不分家、橡皮图章等谚语中农业元素的出现时间及变化,从语言学的角度梳理出九种拉美作物的在华传播史。张教授强调,随着更多美洲作物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它们对中国语言文化可能产生新的影响。

木薯是人类最早食用的块茎类粮食之一,两方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对比作出新的阐述。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所倪根金教授在《美洲木薯在华南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报告中考察了木薯在中国华南地区的传播,借助光绪年间的《高州府志》以及大量的木薯调查报告和口述史料,确认了木薯于1820年左右首次传入中国南方的史实,并对面包木薯、东南亚木薯和中山木薯等品种传入华南地区的时间和途径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倪教授认为,木薯在华南地区的种植,不仅缓解了粮食短缺问题,在荒年以及抗日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还作为华南美食原料、动物饲料以及工业材料发挥着多样价值。而哥伦比亚共和国银行—卡塔赫纳分行区域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玛丽亚·莫德斯塔·阿吉莱拉·迪亚兹(María Modesta Aguilera-Díaz)博士在《哥伦比亚木薯历史述考》报告中,根据考古证据推断木薯是亚马逊和哥伦比亚北部丛林地区的前西班牙时期作物,提出了野生木薯的驯化至迟在公元前4700年已经开始的观点,强调了土著居民在开发、改进木薯种植生产技术以及收储工艺方面的贡献,认为他们利用适应不同地理条件和气候变化的木薯来补充土著社区营养基础的特殊做法充分体现了哥伦比亚人民对木薯的多样开发,并借助数据和图表展示木薯的对外传播路径、现代木薯的全球产地以及哥伦比亚当地的木薯生产和加工情况。

特色作物的研究中还有辣椒、南瓜、花卉的讨论。墨西哥查平戈自治大学植物技术系副主任马里奥·佩雷·格雷斯科(Mario Pérez Grajales)教授的《墨西哥辣椒的多样性》报告借助《曼扎诺辣椒》(CHILE MANZANO/ MANZANO PEPPER)图解手册,介绍了墨西哥最著名的曼扎诺辣椒的种植环境和植物形态,以及黄灯笼辣椒和小米椒在墨西哥地区的种植情况,并利用地图呈现了墨西哥地区现有的64种辣椒的种植分布,介绍了巴西拉辣椒、瓜希柳辣椒等干辣椒与塞拉诺辣椒、古韦罗辣椒等鲜辣椒在辣椒素含量差异研究中的最新成果。东南大学历史系李昕升副教授在《南瓜在中国的引种推广及其影响》报告中详细地介绍了南瓜在中国的引种、推广历史,认为中国的劳动人民经过认真地观察和总结,在南瓜传入中国不久后就创造性地总结出一整套南瓜栽培技术体系。南瓜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对缓解饥荒起到重要作用,还改变了我国蔬菜作物的传统结构,成为了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由此形成的南瓜文化最终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所魏露苓教授在《南美洲花卉在岭南的引进和传播》报告中,指出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除了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外,拉美花卉也传入中国并被记录在中国的农业历史文献中。魏教授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朱顶红、孤挺花、鸡蛋花、紫茉莉等拉美花卉在华传播历程,分析指出了朱顶红和孤挺花之间的差异,认为相较于被广泛研究的美洲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拉美花卉传入中国的时间、地点、路径等问题具有更加广阔的研究空间。

此外,拉美学者还论及历史悠久的拉美农业系统,如颇有特色的土地利用、农田水利、乡村社会规划、遗产保护等方面。秘鲁圣马斯科国立大学考古与社会科学院皮特·范·达伦·卢那(Pieter Van Dalen Luna)教授在《西班牙殖民前安第斯山区的农业生产优化策略》报告中系统地介绍了安第斯山区最重要的农业土地利用形式——梯田,重点讨论了当地土著根据不同地区土壤差异,不断优化梯田开垦策略的发展过程。他以土壤系统十分复杂的阿普里马克山区为案例,借助灌溉水渠的分布网络逐一介绍了形态各异的梯田区块。而安第斯山区梯田修建方式在印加时期前后由“挖掘式”优化为“填充式”,根据实际地形条件发展出了“高架式”“扁平式”梯田形态及其种植作物。卢那教授强调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智利北部的农业生产形式与秘鲁梯田耕作形态的一体性,认为深入研究印加时期安第斯山区特殊的梯田修建策略对安第斯山脉沿线国家有着重要意义。秘鲁—中国发展与科学研究中心人类学家西奥·帕雷德斯(Theo Paredes)博士在安第斯乡村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划方面拥有35年的研究经验,他在《古代技术对当代社会经济效益的影响》报告中指出,安第斯山脉几乎没有大规模农业生产的空间,但在古代安第斯文化中对“生产力”“可持续性”概念的理解,即“持续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对其人口的增长、维持和发展至关重要”理念的指导下,形成了包括梯田、山脊防寒和地下灌溉渠系统在内的较为完整的可持续性农业生产系统。帕雷德斯博士指出,现存的安迪内斯梯田遗址拥有巨大的生产潜力,通过整理、改造后可直接纳入农业生产,呼吁要正确地保护和开发这些农业文化遗产,并探讨通过推动国际组织与土著社群合作,将安第斯山区祖传农业生产设施融入现代国家经济生活的可行性。

三、以学术交流带动技术合作

中国—拉丁美洲农业历史国际研讨会是中国和拉丁美洲农史专家们首次面对面地进行中拉农业农作物传播史的交流,会议呈现出与会人员的多样化且年轻化、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有拓展性、研究视野的开阔和研究方法丰富等特点,拓宽了传统农史会议的内容,也突破以往国际性农史学术会议仅限欧美国家专家学者的局限。

与会专家学者的报告材料新颖,视野独到,涉及的学科较多,且各具特色。研究领域从作物的起源、

(下转第139页)